

目 录

我在中国銀行的一些回忆.....	馮耿光 (1)
忆語随笔.....	曾毓雋 (20)
复辟之役馬厂警师亲历記.....	陈文运 (33)
我参加討伐张勋复辟之回忆	叶恭綽 (51)
我在复辟之役中的亲身经历	苏錫麟 (59)
吳光新在长江上游的兴败	費澤普 (72)
参战軍与直皖战争概述	韓世儒 (78)
我在王占元幕下的活动片断	楊文愷 (90)
直皖战后直系势力的扩张	湯薌銘 (99)
1921年直軍援鄂的经过.....	张方严 (105)
孙中山与张作霖联合反直紀要	宁 武 (115)
二次直奉战时閻錫山与直奉皖	
軍閥的勾心斗角	周 玳 (122)
第二次直奉战争随軍見聞	謝宗陶 (141)
吳佩孚敗退天津瑣記	潘承祿 (158)
吳佩孚之再起与潰敗	李炳之 (162)
1926年吳佩孚的重返洛阳	王維城 (179)
吳佩孚流寓四川五年中的	
陰謀活动	黃应乾 陈祖武 刘克俊 (183)
张宗昌兴敗紀略	王瀚鳴 (210)
段祺瑞公館見聞	王楚卿 (236)

附注

对《吴光新在长江上游的兴败》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《选辑》第五十一辑二七五页

对《段祺瑞公馆见闻》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《选辑》第五十一辑二七六页

我在中国銀行的一些回忆*

馮 耿 光

我自从1918年3月到中国銀行（以下簡稱中行）担任總裁算起，到今年已经有四十五年了。在解放前的三十几年中，1928年前我曾两度担任總裁，以后一直专任常务董事，只在抗战胜利后的几年中改任高等顧問。解放后，中行改組获得新生，我又重新担任董事，不觉又已十四年。

1918年，我在临城矿务局任督办，这个矿局是由华比銀行投資中外合办的。督办由中国方面委派，薪金按法郎計算，最初待遇很丰，后来因法郎貶值，逐漸降低。馮国璋到北京就代理大总统后，曾有意要我担任陆军次长，我虽是日本士官学校出身，但只在很短时期中帶过部队，对于政治一向不感兴趣，因此我对于这一职务很觉躊躇。正在这时，王克敏做了財政总长，要想找一个和馮有渊源的人担任中行總裁，遂来拉我去接替他这一职务。我熟思之后，就决定到中行来。四十五年来，我在中行的职务，虽有变更，始終沒有脱离过。現在把我在中行经历的重大事情，就記憶所及，概述数事于下：

* 附注：馮耿光字幼伟，广东省中山县人，現年八十一岁，日本士官学校第二期毕业，曾任清政府軍諮府第二厅厅长，北洋政府总统府顧問，中国銀行總裁，新华銀行董事长。解放后，任中国銀行和公私合营銀行董事。这稿为馮口述，由林汉甫記錄整理。

从反对袁世凱称帝说起

袁世凱称帝前，梁启超、蔡锷等密謀反对。王克敏清末曾在日本任留学生监督，与梁启超結识很早，交情不浅。1913年王在中法实业銀行做中国方面的代表时，曾替袁世凱向該行借到一笔錢，但没有密切关系。由于他的官癮很大，喜欢熱鬧場面，遂经常参与梁、蔡的密謀。我那时是总統府顧問兼临城矿务局督办，事情很闲，也常和他們在一起活动。我們这帮人当时虽对袁认识不清，但贊成共和、反对帝制是一致的。有一天，蔡松坡相识的妓女小凤仙問蔡为什么反对袁世凱做皇帝，蔡說：“現在我們大家見面拉拉手就行了，如果让袁做了皇帝，我們就要向他跪拜，那还受得了。”蔡在云南起义后，即率部队进攻四川。唐继尧的部队跟在后面，态度不十分明朗，如果蔡部軍事不很得手，唐部很可能叛变。

就在这时，我到天津，住在利順德飯店，遇見王克敏，他邀我去見进步党負責策划的人——蹇念益(季常)。蹇把当时形势讲給我們听，认为必須北方軍人中有人起来响应，蔡的声势才能壮大，反对帝制的起义才能成功。蹇的意思要我赶快到南京去見馮國璋，劝他早日表明态度。我看到此事关系重大，立即答应下来。这时袁的密探布滿在交通要道和头二等火車中，必須机密行事。当天我就乘三等車南下，到南京时正值午夜一点多钟。我乘車到馮居住的上將軍府(即太平天国天王府旧址)，門卫問我来意，我托辞找馮的上菜工友，混进府去，以免惹人注意。这一上菜工友在前清軍諮府做过事，人很机警，这时是馮的亲信。我与他見面后，即嘱其不要声张，将我引到签押房和馮密談。

馮問到外面情形，我就把各地反对帝制的局勢告訴他，并問他

手下有多少军队，打算怎么办？馮說嫡系军队有限的很，所以不敢轻率举动。我就乘机进言說，袁派了两路大军沿着京汉、津浦两铁路南下，表面上是和西南方面作战，实际上对馮也是一种威胁，必須早日表明态度，才是自全之道。馮說，“袁是老上司，如何可以反对。”我說，“袁如不做皇帝，还可以保全大总统的地位。反对帝制，就是为了袁本人和其子女后代的安全，正是爱护老上司。”馮听了我这番話，劝袁退位的意思才最后决定，立刻吩咐一位賀秘书当晚草拟电稿。次晨我見到馮时，他已坐在那里看电稿，经我一同参酌，稍加潤色，即于是晨6时发出。

这封电报拍发以后，整个政局为之一变。进步党梁启超等通过王克敏和我与馮拉上关系。后来馮任代理大总统，梁任財政总长，王和张嘉璈任中行正副总裁。后王接任財政总长，就約我去接替他的职务。我和馮系前清軍諮府老同事，认识最早，交情也很深，但担任中行总裁，却是梁、王的主意，不是馮自己找我的。

王克敏与张嘉璈在中行

在1918年到1928年間，中行总处主要是由王克敏、张嘉璈和我三人共同負責主持，遇事大家商量，分別联系办理。王和我均先后两度担任总裁，张則一直担任副总裁，具体主持銀行业务，沒有更动过。

我和王很早就认识。他的父亲王子展(存善)，一向在广东做官，交游很广，与我家有世交，因此我和王家父子都很熟悉。王在清末从日本回国，因为他的父亲和直隶总督陈夔龙(筱石)有交情，由陈保举他做天津交涉使。辛亥革命后，馮国璋調任直隶省都督，王仍任交涉使，我曾从中介绍，这是馮、王結识之始。有一次馮在交涉

使署宴請各国駐天津領事，馮的卫兵不滿意所发的車飯錢，吵鬧起来，王不顾情面，當場申斥。馮对王的举动不但不見怪，回到都督府还惩办了鬧事的卫兵，因此两人的交情倒反而更深一层。王经手中法实业銀行借款^①时，袁世凱送給他一张一百万元的支票。那时他因为眼睛不好，住在北京六国飯店，要由人扶到总統府去签字，他回到飯店时，曾拿这张支票要我替他瞧瞧金額，并問我要不要拿点錢去用。我对他开玩笑說：“至少要分我一半，少了沒有用。”这笔錢在当时为数不小，很可以供他揮霍一陣。王在北方很久，对于軍政界各方面人物，都有拉攏，人很机警，政治嗅觉也灵敏。我們在这方面时常要靠他代为筹划应付，特别是在曹錕、张作霖等人当权时期，中行对外交涉，都是由他出面进行。他在中行多年，关系很深，但对于行里人事，除了两次大裁員外，很少过問。在历次政潮中，中行也沒有因为王的政治活动而卷入漩渦中去。

张嘉璈是日本庆应大学出身，在未进中行前，曾在浙江省議会和北京參議院做过秘书，很为王家襄所信任。他到中行来，大概是通过进步党的关系^②。他那时年紀很轻，但一般朋友、同事都认为他是政客，有时大家談得很熱鬧，他一来到，談鋒馬上冷淡下来。1916年中、交停兌时，张在上海分行任副经理，曾与经理宋汉章共同筹划，抗拒北洋政府停兌命令，照常兌現，在对外宣传聯絡方面，做了許多工作，但两人相处始終不甚融洽。宋也是经常用“政客”两个字来形容张的举动。有一个时期“政客”两个字几乎成为张的綽

① 大概是1913年10月的“中法实业借款”。这笔借款为法金一亿佛郎，折合关銀三千九百三十七万余两，而袁世凱政府实收的只有三千零六十八万余两。

② 张嘉璈的哥哥张君勱（嘉森）和梁启超、湯觉頓都是进步党的主要人物。张进中国銀行是在湯觉頓任總裁时期，主要是通过梁的推荐。

号。北伐前几年，每逢中行准备发股息时，我就要电約汉口、杭州两行经理同到上海和宋汉章磋商分担垫款办法。有时宋問我的来意，我回答說：“这不用我說，你心里也明白。”宋問我垫款几时可还，我說：“有錢就还，沒錢就慢点还。”宋认为我說話实在，不像张那样虛伪，說話吞吞吐吐地靠不住，常常約期准还，到期仍然还不了。平心而論，张对于銀行业务经营比較內行，和上海金融界蔣抑卮、李馥蓀、陈光甫等素有联絡，因此在股东会等方面具有一部分力量。他自到行以后，苦心规划行务，貢獻很大。宋汉章的話，也只是一面之詞而已。

我和王、张两人結交有先后，彼此性格和能力也各不相同，但有一个共同的想法，即都想把中行办好，必須維持它的相对独立性，尽量扩大商股权益，削弱官股力量，以免受到政局变动的影响。北洋政府財政部因为需款应用，经常將該部持有的中行股票抵借款項，我們就慫恿他們陆续让售給商业銀行，到北伐前夕，官股为数极少，只剩五万元了。

京鈔停兌后的整理

我就任中行总裁时，北京中行鈔票停兌（即不能兌現洋），已将近两年，市面上鈔票行市时有涨落。北京的銀行、銀号，做这种京鈔买卖投机的很多，其中有一大生銀行的经理，名叫张鴻卿，最为活跃。因此社会上流传的一句联語是：“大財神人称燕老（梁士詒字燕孙，有五路財神之称。有人說民五停兌是他的主张），小錢鬼我怕鴻卿。”可見当时京鈔投机的猖獗了。

北洋政府在宣布停兌时，仅凭国务院一紙命令，上海等地紛起抗命，照常兌現。結果只有北京一地，中交两行（中国、交通两銀

行的简称，下同)发鈔最多，停兌最久，为害也最烈。北洋政府不但放任中、交京鈔在市面上自由买卖，而且还继续向中、交两行大量滥借不兌現的鈔票，推行到市面上去。当1916年5月12日停兌时，中行京鈔发行及存款数共为二千六百余万元，到了1917年12月底，增加到六千五百余万元^①，京鈔的行市也跌落到六折。一般机关官吏，拿到不断跌价的鈔票，不能維持生活，叫苦連天。

我就任中行总裁以后，每逢在公共場所，听到人們談到中行京鈔的行市，又已跌到几折了，总觉得非常刺耳，頗想早日設法加以整理恢复兌現，才能对得起社会輿論，否則連中行的生存命运，也要断送了。因此我在最初二、三年中就经常和中行同事在一起研究如何整理京鈔。梁启超任財政总长时，原有将各国应允緩付的庚子賠款用来整理中、交两行鈔票的拟議。我到中行后，旧事重提，由中、交两行联合呈請政府指定此項緩付賠款及常关税作担保，发行七年长短期公債，归还两行垫款，收回京鈔，总额共計九千三百万元，由1918年5月1日开始发行。但第一次发行的成績不好，截至同年6月29日止，中、交两行共募得四千四百余万元，不及全数之半。且以財政困难，京鈔一面收回，一面发出，增发数实际上超过收回数，鈔价亦随之趋跌，引起各方面的責难。中行乃于同年9月呈报財政部，詳述維持京鈔及整理无效的原因，要求政府不再命令垫发鈔券。輿論方面对于銀行和財政混成一片，攻击尤甚。財政部遂于是月18日行文中、交两行，正式保证不再令两行垫付京鈔。这是整理京鈔的重要关键。

中行自停止垫款后頓呈生机，即向各分行及中外各銀行商借

① 这些具体数字和日期，是由记录整理人林汉甫查考有关資料予以补正的。

現金，收縮京鈔。以前售余的公債，也由財政部明令繼續發行售募，計自是年10月12日至次年10月4日一年間共募得長短期公債各一千三百餘萬元，收回京鈔二千六百餘萬元。中、交兩行京鈔流通數目，從1918年4月30日公債發行前的九千三百萬元壓縮到1919年10月4日的三千八百萬元，減少約六成。但中、交京鈔市價仍在五折之間，不但不見上升反而下降。各方面紛紛提出整理辦法，中行股東聯合會在上海開會時，也有具體建議。適中行修改則例問題又在臨時議會引起風波，中行京鈔市價較交行京鈔更為低落。

直到1920年春間，因新銀行團在巴黎組成又有大借款成立之說，鈔價逐步上升到七折。中、交兩行認為整理較易着手，便呈請政府發行公債，將京鈔全部收回。但以各地戰事又起，未能實現。且因直皖兩軍在京津一帶作戰，人心恐慌，於是鈔價跌到四折左右的歷年最低價。其後戰事他移，財政部於9月19日重申前請，呈准政府以關余為担保，自10月1日起發行九年整理金融公債六千萬元，除以二千四百萬元歸還銀行墊款外，余數按照票面收回中、交兩行京鈔，以四個月為期，並規定逾期以後京鈔停止流通，無論公私機關，不得再有出入，亦不准再有行市。如京鈔持有人及存戶不願購買公債，准其分向中、交兩行換立分期歸還的現金存單，其利率期限悉與公債相同。所有收回的京鈔，一律切角燒毀。

這時，京鈔數額，已較前大為減少，流通既有限期，商民不敢觀望，投機家也受到限制；且多數積存在各路局及稅收機關，收銷較易。遂在四個月期限內，發售公債五千八百餘萬元，除歸還銀行墊款外，換回中、交京鈔三千四百餘萬元。所余公債一百九十餘萬元，分交中、交兩行作為兌換零星京鈔之用。京鈔收回工作至是基本上告一段落。

中行因为財政部发給的公債，不敷归还垫款，京鈔轉为存款者頗众，致发出定期存单二千二百余万元，負担甚重，而本身資金不足以应付，乃由王克敏、张嘉璈、吳震修（榮豐，时任京行副经理）和我共同商量，另行添招商股四百万元，补充实力。不料上海发生证交风潮，因而未能招募足額，头寸仍很紧迫。所有各項京鈔存单自1921年第三期起未能如約履行照付，不得已又与存戶协商仍用金融公債換回前出存单。但中行所存債券，因筹借政府垫款，多已陆续变抵，只好在1922年下半年再向各商业銀行借入金融公債一千万元，以換回存单。所借公債，按照票面金額，分为六十一个月归还本利，由总行及沪、津、汉三行共同負担。这样，中行京鈔存单的結束，又拖延了五年之久。中行董事会在1929年报告中曾指出，“其后此六千五百余万不兌現紙币之整理，半由政府发行公債，半由本行自筹資金，其間因应补苴，費十年之力，直至民国十六年，始首尾清結。論国家，論銀行，其受損失，固不待言，而他日談我国币制者，此实一不可忘之事实。”

有些投机商人，在京鈔整理过程中，受到打击，故极力反对、阻挠。交通京行经理胡笔江利用交行京鈔作为投机工具，結交官府在市場上操纵获利，对整理京鈔很不贊成，后来看到反对无效，便挾帶投机所得巨資，辞职到上海去。大生銀行張鴻卿曾对我說过，“你們政府銀行发行的鈔票，又何必兌現呢？”他虽不懂什么貨幣原理，其主张却和国民党政府一样，只是北洋政府的手段，远不如蔣介石国民党那样毒辣罢了。

安福系阴谋夺取中行

1913年頒布的中行則例，規定中行的總裁、副總裁由政府簡

任，造成了該行主持人随着財政总长的更換而进退的局面。自从該行正式成立到1917年不到五年期間，前后担任總裁、副總裁的共有十一人之多^①，中行就此成为財政部的外府，也是各派政客官僚爭夺的对象。1917年10月梁启超任財政总长时，約請日本財政学家堀江归一博士到北京演讲貨幣銀行問題，并就中行修改則例，恢复兌現等事，提供意見。堀江认为“欲恢复兌現，非先停止增发鈔票不可；欲停止增发，非停止墊款不可。然欲停止墊款，則不可不变更組織，使保持銀行之独立，不随政治为轉移”。因此他极力主张正副總裁由政府在这所选举的董事中任命。第二年財政部重新修改的中行則例，就采用堀江的建議。則例明文規定總裁、副總裁由政府于董事中簡任，而董事則由股东大会选举，任期四年。我就是由中行第一次股东大会选举为董事，再由政府簡任为總裁。后来財政总长虽然时有更換，中行正副總裁，按照則例規定，不再随之进退。这样，中行才脫离了北京政局更迭的影响，整个局面开始稳定下来。

孰知到了1919年安福系得势，又发生很大的风波。安福系政客想夺取中行的管理权，借口中行新則例只由馮国璋以代理大總統命令公布施行，当时国会解散，沒有经过立法程序。該系議員乃在临时議會參众两院，提出修改中行則例的新議案，要把總裁、副總裁由董事产生等規定完全取消。但是各地中行商股股东普遍反对，西南軍政府和各地方商会等方面亦都通电指責。北洋政府總統

① 自1913年4月中国銀行正式成立到1917年6月，先后担任總裁、副總裁的計有：孙多森(蔭庭)、聶其煒(管臣)；陈威(公孟)、吳乃深(德臣)；湯叔(觉頓)、項藻馨(兰生)；薩福琳(桐孙)、李士伟(伯芝)；周自齐(子廌)、徐恩元(榮光)、俞凤韶(襄澄)等十一人。

徐世昌和代理国务总理龔心湛，看到情勢不妙，也主張慎重，該案才以“付審查”為名擱置下來。然而安福系政客並不甘心，仍利用同年4月中行股東會在北京江西會館開會的機會，進行搗亂，串通少數股東到會質問中行當局，企圖恢復1913年舊則例，引起激烈的辯論。但因行方握有大多數股權，終于否決了他們的提案。這年冬天，該系議員王伊文等又在眾議院，提出查辦中行正副總裁案。在未提出之前，特托人向我示意，我一笑置之，並致書友人云，“我對於此案不特不為疎通，且盼其成立，依法行查，借明真相，未始非銀行之福也。國家財政，久無辦法，國家銀行，又何能辦，故久有求去之意，不過今日尚非其時耳。現在既有責難，只可鎮靜以待，若因此遽行求去，則我將何辭以自解。”等到該案提出通過後，中行即瀝陳經過，呈請財政部徹查。財政部派員形式上查了一通後咨復眾議院，同時我們又從人事上對該系部分政客進行聯絡，軒然大波才平息下來。

1921年中交兩行的擠兌風潮

1921年秋冬之交，交通銀行總理曹汝霖搬到北京佟府夾道新房子裡去。這房子有一個小型戲台，可以招待一、二百人看戲。親友們遂在11月16日以祝壽為名，舉辦了一個堂會，大家湊湊熱鬧。孰知戲碼已經排定，將要開演，忽然有人來報告，北京中、交兩行同時發生擠兌風潮。那時中、交的不兌現京鈔，已經全部收回，但實力不充，加之財政部在這年又先後向中、交兩行借墊軍警餉款四百八十萬元及公債基金墊款七百萬元，因此新發兌現鈔票的現金準備，極為缺乏；此外還有大量以京鈔掉換的定期存單，流在外面，即將到期。這些因素就是引起擠兌的原因。

这次挤兑风潮，因为头寸短缺，两行一开始时便采用限制兑现的办法。每有钞票五元，只兑付现洋一元，余四元仍付钞票；且于付款时，故意将现洋反复敲打，手续异常缓慢。只听见叮当叮当的声音不绝于耳，十分热闹，实际上是为了多拖延时间，少兑出现洋。后来连一点现洋亦不搭付，等于停兑了，于是中、交钞票在市面上又有了行市，其情形的严重，不亚于1916年的停兑风潮。中、交两行都感到内部空虚，彼此互相探听对方实力情形，生怕倒闭在对方的前头。

当时北京的步军统领王怀庆对于挤兑风潮，非常注意，曾经会同内务部、京师警察厅共三方面代表，深夜召集中、交总行负责人去谈话。我和张嘉璈代表中行，曹汝霖、任振采（凤苞）代表交行，接连去了好几次。王怀庆和内务部、警察厅的代表坐在长桌的上首，我等坐在下首，问话时态度严肃，一再追问中、交两行的现款到哪里去了，是不是私人挪用了，对于交行尤其不客气。有一次，警察厅长殷鸿寿说：“若在外县，发生有錢庄停兑倒闭等情事，经理人是要枷首示众清查财产的。这次在北京城里，客客气气，还不好好交代清楚。”我听后气愤极了，就站起来说：“今天我们四个人都在此地，可以暂时拘禁起来，请派大员彻底清查中、交两行账目。如果有私人挪用公款，以致发生风潮，情愿以身家生命抵偿。”王怀庆看到这一局面弄僵了，就说：“您不必动气，大家坐下来好好谈谈，想个办法，应付这个局面。”这才缓和了全场的沉重空气。经过中、交当局向各方面疏通，终于把这事搁下来。因为这次问话，是由三个官厅共同召集的，我们就把它叫做“三堂会审”。

中行的亏空没有交行大，京、津两行又由沪行宋汉章等装来现洋接济，因而这次风潮，经过半个月的纷扰就解决了。交行风潮拖

延較久，最后听說由叶恭綽经手，向奉天省官銀号借到現洋四百萬元，于次年1月間对外无限制兌現，才把風潮平息下去。

张志潭是直系大将，在靳云鵬內閣中先后做过农商、內务、交通三部总长，对于中、交两行的态度，显然有所不同。遇有关于銀行方面的事，处处与交行为难，大有非挤垮不可之势。这次風潮发生后，他时常問我交行內容如何。我和他原有世交，彼此相识多年，交情不錯，但他为什么对交行如此痛恨，最初我还不明白。直等到梁士詒由张作霖保駕做了国务总理，吳佩孚通电攻击张、梁，常要牵涉到交行，才知道这完全是一种派系的傾軋。后来奉系失敗，梁士詒下台，交行发生动摇，幸由股东联合会推举张謇、錢新之（永銘）担任总理、协理，才把局势挽救过来。

几任總裁的更替

我从接任總裁后，先是应付京鈔停兌后的局面。京鈔的整理、兌現剛告一段落，1921年挤兌風潮又突然发生，虽在两星期后就归于平息，我个人却不願再干下去了。我对王克敏說：“这一局面，我实在应付不了，还是仍由你来担任總裁吧！”我的母亲也說我年刚四十不宜負此重任。因此第二年（1922年）第二届董事会就改推王克敏为總裁，我退居常务董事之职，副總裁仍由张嘉璈担任。王就职后，因为全行开支庞大，曾大批裁减总处人員，并于次年在济南召集經理會議，商定各分行担负总处开支及維持京行的詳細办法；又組織业务委員會，各分行經理担任委員，共同解决各分行的善后問題。

王接任不过一年光景，又去做財政总长，中行總裁职务，由董事会改推金逵（仍珠）担任。金曾在梁启超任財政总长时做过財政

次长，后由浙江兴业銀行叶景葵、蔣抑卮等人推荐，做了中行董事。金在我們这些人中，年事稍长，作风稳健，一切措施，率由旧章，不轻易更动。中行业务，在他任期内，也逐渐走上稳步进展的道路。1926年第三届董事会成立，他继续担任总裁，但因病重不能到行执行职务。王克敏又以其他原因，不便出面，我遂再度被推为总裁。这时北方已在奉軍控制之下，政治、经济紊乱达于极点。

早在1925年，中行香港分行经理貝淞孙(祖貽)就写信給北京总处，报告国民党自从1924年改組以后，有国际援助，声势很好。第二年北伐开始，貝又报告国民党政府向广州銀錢业借款八十万元，雇用挑夫把現洋放在砖头下面，挑过粵贛边界大庾岭，作为中央銀行的发行准备，并且說北伐軍力量雄厚，組織严密，胜利有百分之百的把握，可以打敗北方軍閥。王克敏、张嘉璈和我三人在一起商量，认为北方政局腐敗，是我們所亲眼目睹的，軍隊不能打仗也是事实，但南方动态究竟如何，却不敢轻易相信，最好能有一人亲自去看看。王、张两人认为我是广东人，如果前去，比較不惹人注意，我也同意以探亲为名回家乡去一趟。

我到广州，看見那里各方面情形，另有一番新气象，和北方完全不同，住了一时就回来。不料路过南京时，被孙传芳知道行踪，派人約我去談話。我原无意見他，但又不便推托，只好勉强去应付一下。孙首先問南方情形如何，“赤化”能不能成功？我推說他的消息灵通，一定比我知道得还清楚。孙进一步用請教的口气征求我的意見說，“你是我們的老前輩(孙是日本士官学校后期学生)，大家可以暢快談談。张作霖是土匪，蔣介石是流氓，两个人都来拉攏我，你看我和那一个人联合比較好？”孙接着又說，“北伐軍很能打仗，不容易抵挡。”我当时心里想，这种重大的事情，岂可以随便答复，

只好用空洞的話來搪塞一下。不料我回到北京時，孫已和張作霖搞在一起了。我看到南北政局將發生重大的變化，就和王克敏、張嘉璈兩人商量，由王和我留在北方，應付北洋軍閥，張嘉璈因母病很重，正好趕到上海，就與國民黨聯絡，相機應付。這種局面，一直維持到1928年總處搬到上海時為止。

張作霖、蔣介石向中行強迫借款

我在北方多年，熟人很多，維持中行局面，本不致有什麼問題。不料有一天，駐在保定的奉軍第三、四方面軍團部，忽然派一參謀到中行總處來找我說，他們有一筆進口押匯的軍火，約值三十萬元，在未交貨付款前，洋行方面要求銀行担保，張學良要我以中行名義簽字担保。我因茲事關係重大，推說須經董事會通過，而當時各董事散居各地，無從召集，難於照辦。對方堅持不允，最後說要派一副官帶領憲兵四人護送我到保定去見張學良，當面商量。我想此事不妙，遂找陸軍次長楊毓珣設法。楊說：“千萬不可同去，否則便沒有辦法。”即由楊親自找張作霖說明原委，一場虛驚，才算平安渡過。

張嘉璈在上海應付國民黨政府的需求，也不是很順利的。他和黃郛、陳其采、錢新之等人，原來都是很熟的朋友。當北伐軍到上海時，國民黨就指派陳、錢等人組織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，中行由吳震修代表參加。有一次這個委員會議決，先湊二五庫券墊款一百萬元，送到南京去，要中、交兩行各擔任五十萬元。先是錢新之與宋漢章商量，宋不允墊借，後由吳向宋勸說，宋仍堅決不答應，並且說：“孫傳芳軍隊，已經過江來了。”吳看到這事無從下台，就賭氣不管，一個人溜出邊門跑去看電影。因為這筆墊款發生波折，財

政委員相繼辭職，蔣介石大為不滿，第三天就打電報給宋漢章，非要借一千萬元不可，措辭異常強硬，雖經再三疏通，最後還是分期照借了。二五庫券第一次發行總額就有三千萬元，滬行擔任的數目也不少。宋漢章因為不善于應付，堅決要求辭職，遂由總處決定把宋提升為滬區行總經理，後由董事會推為常務董事，所遺滬行經理職務，由貝淞孫接任。

國民黨政府攫奪中國銀行

1928年中行被迫改組，增加官股，是國民黨攫奪中行的開始。這年中行總處從北京搬到上海，我也下決心把北京的房子賣掉，移家南下。同年11月17日中行在上海銀行公會開股東常會，由我主持。原來議程中列有改選第四屆監察人和第三屆董事兩案，卻因為國民黨政府已於10月26日公布中國銀行條例，不得不臨時撤銷，故於常會後接開股東臨時會，同意接受國民黨政府的改組方案。張嘉璈實際上是參與方案的擬訂的。

根據這一方案，中行改組為“特許的”國際匯兌銀行，把國家銀行的職能拱手讓給中央銀行。中行的官股除原有五萬元外，增加四百九十五萬元，以公債撥充，合為五百萬元，計占股分總數五分之一，由財政部加派官股董事三人、監事一人。原任商股董事監事，雖未滿期，全部改選。王克敏因幫助北洋政府借款，已於是年4月間被通緝。董監事人選中與北洋政府關係較深者，均掉換為與國民黨接近的上海工商界人士和華僑富商。總處組織也由總裁、副總裁制改為董事長、總經理制，由李馥蓀任董事長，張嘉璈任總經理。我本不願意擔任總裁，就此擺脫這一職務，專任常務董事，不再到行辦事。這是中行歷史上一個重大的變遷，中行在北洋政府